

近日,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表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推动优势区域聚集发展,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河北正谋求把“环京贫困带”建成“脱贫致富示范区”。

2010年底,河北省就已提出将在环首都经济圈内建成若干个与北京对接的产业园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会展与服务外包产业等新兴产业,承担北京产业转移。

但是,对于北京的优势资源,不仅江浙等省市正在加紧引进,即使是京郊各个区县如怀柔、丰台、房山等地,亦在加紧争夺。因此,冀望通过与北京的合作,利用北京的科技、智力、金融资源以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形成,河北省

需要有更多的策略和筹码。

在借力的同时,加强自立思考、统筹规划,对于河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许更为重要。在未来的竞争中,河北省在借力北京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强调自身“造血”功能的完善。

就未来的发展而言,河北省应该积极营造促进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氛围。要结合自身发展特色,探索符合本地所需的产业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也要积极助力本地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如果没有自身实力的提高,很难想象,环首都经济圈的4市13县,会不会再像燕郊一样沦为北京的“睡城”。

一周评论

打破路径依赖

■周熙檀

春节前不久,广东某市市长提出,希望科学院能够派驻科技人员担任企业的科技副总裁。

企业的发展对于技术的认识会更多局限在一个点上,很难对于科技走势和前沿科技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科技副总裁的设立,能够帮助企业拓展视野,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大有裨益。

然而,这个创新的点子来自于政府官员的大脑,而不是企业。

从我国高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上,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原因所在。

国务院确立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园区从观望到布局,然后陆续发布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亦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科技工作的重点。

但实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提法。具体到各地,大多只是将高新技术产业换了个名称而已。各地高新区存在的使命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此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有专家指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上花大力气的主要是江苏和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新区。为什么?想打破路径依赖。

“广东和江苏都存在对传统产业路径依赖的问题,比如东莞、佛山、温州等地区,制造业发达,民间资本充沛,但高新技术产业的起步发展相对较晚。”有关专家指出。

早期,在这些经济大省的工业总产值中,科技的贡献率并不明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背景之下,经济大省对于科技的需求快速爆发。

企业家是厌恶风险的,做传统产业熟悉又能赚钱,自然不愿意主动涉身高投入、高风险的新高新技术产业。

但是政府意识很清醒,必须去推动、去引导甚至去创新。相比国外发展产业都是靠技术和市场的驱动,我们目前更多还是要依靠政府引导,尤其是高新区建设,政府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推手。

政府在产业起步之初扶上马、送一程,有利于打好发展的基础。但是当企业感觉到政府这只手越来越强大,而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弱时,我们必须正视和检讨: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要遵循市场的逻辑。

只有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这颗创新的“种子”,才可能长成大树,甚至集聚一片森林。而内在创新的动力和行动,以及产业集聚,正是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

连线



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

创新体制对话世界

■本报记者 周熙檀

2010年,成都高新区提出了“大孵化”理念,从“在高新区办孵化器”转变成“把高新区办成孵化器”,构建包括孵化载体、技术平台、人才培育、梯形融资、知识产权、市场开拓等在内的支撑自主创新的“大孵化服务体系”,目标直指“建设中国发展环境最好的区域”。

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不断的体制机制创新,而建成体制创新的先行区正是天府新区发展的目标。

成都高新区作为天府新区创新发展的高端示范区,始终将体制机制创新放在创新工作的第一位。“大孵化”理念的提出,可以看出成都高新区对于科技园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载体的认识更深入,对于世界一流园区的发展认识也更进一步。

一根电线杆引发的创新思考

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成都高新区。从国家层面来说,集中批准高新区,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尝试;然而对于新成立的成都高新区来说,面对的问题却是具体的。

“高新区的管理权限还没有落实。管理权限不落实,高新区的体制优势就不能发挥,发展速度也就跟不上。”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说。

一次,高新区要安装一根电线杆,花了半个多元时间也不见动静。高新区管委会所在行政区

山西农业科技跨国推广转化

■本报记者 郑金武 程春生

中央一号文件、《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涉农文件,成为最近社会上广泛讨论的热点。

在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以下简称“农科院环资所”)所长张强研究员看来,涉农文件频出,是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推动,尤其是文件中反复提到的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转化应用、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内容,更是为自己正在开展的科研工作鼓了一把劲。

近年来,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通过在山西寿阳、天镇、山阴、应县等地建立定点农业示范园区,探索农业科技推广转化新模式。

自2008年开始,在国家科技部等部门的支持下,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更是将农业示范区建到了摩洛哥、赞比亚等国家,推动了中国的农业科技在非洲等数个国家推广转化。

定点扎根才能做出示范效应

2009年3月,山西省提出实施“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将盐碱地改良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列入示范推广行动中。

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盐碱地改良技术。2000年4月起,该所与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签订协议,就山西省大同盆地盐碱地改良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内容是利用火电厂烟气脱硫废弃物和盐碱地专用改良剂进行大同盆地盐碱地改良研究和大面积示范推广。

2010年,经山西省农业综合开发办立项,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实施了“大同盆地盐碱地改良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分别在大同市、朔州市等多个县建立了重度盐碱地、中度盐碱地和轻度盐碱地改良核心试验区和示范区,开展盐碱地综合改良技术效果试验、示范。

“之所以能够开展这样一项工作,与我们长期的工作积累不无关系。”张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山西大同,环资所建立了数个示范点作为定点的农业科技推广基地,并常年有人维护。

正是因为长期的工作积累,大同盆地盐碱地改良工作推进十分顺利。张强带领团队科研人员,在大同盆地盐碱地地区建立了内陆半干旱型盐碱地综合改良技术体系,并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从而使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



农业技术示范园区的建设,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加工业、林牧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图为盐碱地改良技术示范与推广现场。

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供图

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显著。

通过项目实施,环资所在大同盆地盐碱地建立起核心试验区800亩,示范区5000亩,彻底改良盐碱地1万亩。同时,这一示范项目也带动了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加工业、林牧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而在山西寿阳县地区,农科院环资所也建立了晋东豫西旱农试验区。据介绍,该试验区始建于1992年,先后完成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并通过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建立了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体系,形成了多项技术规程,成为我国半干旱半湿润地区重要的示范园区。

长期扎根,使研究人员对当地农村农民的需求了解十分精准,研究工作因此更有针对性。“多年来,这个基地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水肥耦合试验、高效农艺节水技术集成示范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张强表示。

项目支撑农业科技国际推广

2008年11月12日,中国科技部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签署了《非洲环境技术与体制合作交流框架》谅解备忘录。受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委托,山西省农科院环资所承担了“非洲干旱预警机制及适应性技术示范”项目的工作任务。

借助国际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张强带领研究不断到海外建立农业技术示范基地。从2008年起,张强及其团队先后在摩洛哥、利比亚、赞比亚、埃及等地开展了干旱预警与适应性技术研究,并在摩洛哥和赞比亚建立了试验区,并建立了干旱预警模型。

解文艳博士是张强研究团队中的一员。为了项目落实,解文艳曾随同团队前往摩洛哥、赞比亚等国开展调研。“在这些国家,我们深入田间,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流。农业科技推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民农村的现实需求。”她说。

张强介绍,项目实施以来,项目组先后5次赴摩洛哥、赞比亚等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通过召开技术座谈会、田间考察、农民走访等方式了解当地农民技术需求,了解当地农业科技现状,开展技术需求调研,取得了一系列技

术资料。

山西寿阳、大同等地的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经验,在为摩洛哥、赞比亚等地建设国际农业科技示范区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我国在干旱预警和抗旱技术方面的技术优势,张强及其团队筛选了抗旱种衣剂、平衡施肥、水肥一体化、秸秆覆盖、地膜覆盖、高垄种植等技术,分别在摩洛哥国家农科院Kenitra灌溉农业试验站和赞比亚大学农学院试验基地建立了技术示范区,通过田间考察和农民培训,宣传、示范、推广中国抗旱技术。

加强支持农业示范园

农业示范园的建立,推动了农业实用技术的使用范围,拓宽了技术输出渠道,展示了中国农业技术成果。

张强同时表示,通过建立示范园,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农业技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集成示范,筛选了更加实用的技术,同时带动中国农业企业走向世界,为发展外向型农业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建设农业示范园,已成为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路径抉择。最近刚刚发布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提出,要积极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大示范区建设力度。并以“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在全国创建300个左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北京的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是国家推动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的样板。此前,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科院的建设,就是要立足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打造现代农业高端产业,促进农业科技推广转化,探索新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张强亦表示,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关键是要能发挥示范园的引领作用。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农业示范园建设的支持,积极探索具有区域特色、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建设模式,通过产业拉动、技术辐射和人员培训等,带动周边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北京市: 以项目为牵引 推动农科城建设

■郭敏

自2010年8月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启动一年多来,部市共同对接,启动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北京市启动典型科技项目15项,从种籽、食品安全、农业互联网、现代物流等几大方面,围绕“一城、多园、五中心”的产业布局,扎实推进农科城建设。

科技专项引导力度不断加强。科技部启动了“十二五”农业科技计划第一期项目,共有14个重大主题,其中生物育种与产业化、农村农业信息化、绿色仓储与冷链物流3个重大专题,以北京市为主要参加单位,聚焦农科城建设。

北京市科委统筹2011年农业领域科技经费总预算1.1亿元,实施了“首都现代农业育种服务平台建设”、“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农业智能装备系统集成研究与产业化”等一批重大项目。同时,设立了“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产业培育专项”,支持农科城建设。

资源聚集取得突破进展。良种创制中心启动,对加速我国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及产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农业科技网络服务中心经过前期“网联工程”项目的建设,有效整合农业科技信息资源,建立了网联机制,促进了资源共享,初步实现了面向全国开展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新发地农产品现代物流科技园也已启动,将为全国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撑。

科技城先行启动了昌平园和顺义园建设,着力打造现代农业先导技术示范基地和全国花卉高端产业服务平台。通州区种籽产业科技示范园等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园,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成果丰硕。一年来,农科城先后举办了“第四届国际生物技术与农业峰会”、“中英现代农业技术转移合作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一批国际技术转移合作项目正式签约,推进了农科城建设的国际化进程。

高端人才聚集工作扎实推进。通过引导国家级工程中心、科研院所、大学及国内外知名企事业单位等懂技术、善管理的专业技术和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技术平台、人才培育、融资担保、市场拓展、行业分析咨询等增值服务,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方面,打造了全国最大的科技孵化园,建立了中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基地,配备了创业辅导、风险投资、房租公寓等服务措施,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常年保持在1700多家。此外,成都高新区重视培育本土大企业、大集团,每年锁定一批重点企业,从市场开拓、上市融资、政策扶持等方面采取针对性内培服务措施,帮助企业快速做大做强。

主编:郑金武 编辑:周熙檀
Tel:010)82619191-8126 E-mail:yqzk@stimes.cn

山西省召开农业工作会议 着力打造农业综合示范园

本报讯(记者程春生)日前,山西省召开农业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打造农业综合示范园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农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据悉,山西将以“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为切入点,以农产品加工“513”工程和三大现

代农业示范区为抓手,坚持工业化理念,实施产业化运作。将把大同、晋中、运城三大示范区、10个示范县和太谷、大同南郊区、运城盐湖区3个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建设重点,因地制宜打造一批种养业专业示范园和设施农业、循环农业等综合示范园。

同时,着力推进百万棚设施蔬菜建设工程,突出抓好寿阳县、新绛县、曲沃县、清徐县、榆次区、夏县、应县、阳高县、盐湖区9个国家级蔬菜产业基地县建设。加强与京津地区特别是京津大农业集团的合作,努力把晋北基地建设成为京津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心的“一站式”服务体系。设立企业方面,原有的7个审批环节被缩减到4个,原来需要5至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审批缩减到50分钟;项目报建方面,原先需要6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现在只要17个工作日。

创新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高新区要弃机关化、弃衙门化。”成都市委常委、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说,“以创新立命的成都高新区,正是用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拉近成都与世界的距离。”

事实上,通过长期的积累与探索,成都高新区的机制体制创新早已“体系化”,在此过程中,成都高新区成功打造了三大服务体系,形成了中国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发展环境,使其中国内地投资创业标杆的形象不断凸显。

政务服务体系方面,成都高新区不仅率先实行了“一站式”服务、“并联审批”和基层“一窗式”政务服务平台,而且围绕项目引进、建设、生产经营3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三段式”服务体系,率先在中西部地区打造“962000”民生呼叫服务中心。

企业增值服务体系方面,成都高新区建立了专业园区管理服务公司、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创新投资公司等懂技术、善管理的专业技术和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技术平台、人才培育、融资担保、市场拓展、行业分析咨询等增值服务,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方面,打造了全国最大的科技孵化园,建立了中国大学生创业服务基地,配备了创业辅导、风险投资、房租公寓等服务措施,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常年保持在1700多家。

此外,成都高新区重视培育本土大企业、大集团,每年锁定一批重点企业,从市场开拓、上市融资、政策扶持等方面采取针对性内培服务措施,帮助企业快速做大做强。

政策支持下甩开膀子干

1992-1996年,成都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建

设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实施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几个问题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成都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的授权很充分,而且从1992年起,所有收益全部留给高新区,“钱不拿走一分,市级权限全给”。这一原则一直被坚持实行了十多年。

在“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框架下,成都高新区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集中发展区。“按照‘体制新区’、‘科技特区’的定位,成都高新区建设从一开始就属于较为典型的‘政府主导推进’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资源整合力强、决策流程短、工作效率高。有了制度的保证,有了政策的支持,高新区于是可以‘甩开膀子干了’。”汤继强说。

实际上,高新区既需要有外部的体制、制度保障,也需要在内部建立高效率的管理、服务、激励等制度安排。从内部体制建设上,1996年区划调整以后,成都高新区按照“小机构,大服务,高效率”的体制建设原则,借鉴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一些管理体制,实行“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作”,并在成都率先实行“一站式”管理。

这一创新,打破了传统行政架构中“条块分割”的局面,每个局都是一个综合部门。这种架构不仅减少了人员,而且整合了资源,提高了效率,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已经极为普遍了,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汤继强说。

2008年,成都高新区再次优化了政务服务中